

韩晓玲 冷惠玲 吴志杰 主编

中国传统
译论思想

论集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传统译论思想论集

韩晓玲 冷惠玲 吴志杰 主编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 岛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传统译论思想论集 / 韩晓玲, 冷惠玲, 吴志杰
主编. —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81125-335-1

I. ①中… II. ①韩… ②冷… ③吴… III. ①翻译理
论—研究—中国 IV. ①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210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

邮政编码 266071

出 版 人 杨立敏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 (传真)

责任编辑 魏建功

电 话 0532-85902121

电子信箱 wjg60@126.com

印 制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7.75

字 数 328千字

定 价 38.00元

前言

中国译论自三国时支谦的《法句经序》至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佛经译论时期、传统译论时期和当代译论时期。

佛经译论时期始于三国止于宋初。自东汉桓帝时安世高译《明度五十校计经》始，魏晋南北朝时进一步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主要代表译论有支谦的“文质”说、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鸠摩罗什的“信美和谐”、彦琮的“八备”、玄奘的“五不翻”，以及赞宁的“六例”。这一时期译论的实践基础是始于东汉的佛典翻译，思想基础来源于中国传统儒道哲学及佛学。

传统译论时期自明清时期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翻译研究的范围更广，深度更深，更系统更全面，不仅提出了翻译的标准、原则问题，还探讨了翻译本身的学科归属问题。尽管主要的学科理论基础是修辞学、语文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但主要的指导思想还是沿袭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代表性的译论有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信顺说”、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王佐良的“原作观”和许渊冲的“三美”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译论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主要表现为大量引入、阐发国外译论、借鉴国外多学科的翻译研究方法、多视角全方位地探讨翻译的重大问题，最重要的是构建了翻译学的研究体系，明确了翻译研究的学科归属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然而，在引入借鉴国外译论的同时，依然没有否定、抛弃中国传统译论，而是重新挖掘、审视我国的传统译论，并从中国实际出发，寻求中西结合之路，依然表现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情结。

中国译论无论如何发展变化，其思想基础一直囿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其思想内涵突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信、美、和谐、包容性，其思想表述囿于中国传统话语的短、精、切，突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顿悟”与“一切尽在不言中”。中国当代译论虽深受国外译论影响，但与中国传统思想一直是“藕断丝连”，始终保持着剪不断的关系。

本书的成书源于2007年我们申报的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翻译思想的哲学阐释》（S07YF36）。项目研究展开后，我们发现有许多研究成果跟我们的部分研究计划相吻合。我们陷入了矛盾中，如果修改我们最初的计划，内容就不完整；如果继续原来的计划，就会出现内容重复的现象。犹豫中，又有一些相关成果在各种学术期刊杂志中出现，于是，我们最后决定收录这些文章，来实现我们最初的设想。

翻译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译界许多学者寻求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交叉研究，对翻译研究进行进一步阐释。但是，翻译研究的许多问题依然难以解决，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寻根求源去寻找答案的原因。令我们欣喜的是，译界的许多同仁也在致力于这项研究，国内出现了不大不小的一股“寻根”热，学者们通过挖掘中国传统译论的哲学思想，以期对翻译研究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尽点微薄之力，也为译界同仁的研究提供文献方便。

编者

目次

上篇：宏观篇

中国传统译论的哲学思想.....	冷惠玲 韩晓玲 / 3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的现代诠释	王宏印 刘士聪 / 9
论中国古代翻译理论的现代阐释	石永浩 / 17
中国传统译论融合统一的两种境界	陈大亮 / 24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嬗递与流变	吴志杰 / 35
创新与承续	李林波 / 44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后顾与前瞻	李林波 / 53
论中国传统译论的批评属性.....	王晓农 / 65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新方向：和合翻译学	吴志杰 / 73
和合翻译研究刍议.....	吴志杰 / 81
华夏文化自我中心观及外来语的汉译	刘英凯 / 100

下篇：微观篇

传事以尽 尚质而无斫凿 委本从圣 求真勿令有失	祝朝伟 / 125
补偿乃翻译之本质：道安“五失本”的启示	夏廷德 / 135
略论慧远对道安的突破和超越	普 慧 / 143
从《辩证论》看彦琮的翻译思想	颜治强 / 154
北宋僧人赞宁的译学思想研究	于应机 程春松 / 158
《宋高僧传·译经篇》所涉译学问题初探	刘 壮 江智利 / 166

中国传统译论基本理念的嬗变与衍化	王洪涛 / 173
论以忠实为取向的翻译标准	曹明伦 / 184
解读严复“信达雅”	林 璋 / 200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社会维度	苏 艳 / 208
论郭沫若的“风韵译”观念及其历史意义	熊 辉 / 217
林语堂的翻译观	周仕宝 / 226
傅雷“神似”译论新探	杨全红 / 234
王佐良翻译观探析	黎昌抱 / 248
“优势竞赛论”本质透析	张智中 / 262
后记	275

上篇：宏观篇



中国传统译论的哲学思想

冷惠玲 韩晓玲

(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烟台 264005)

摘要: 中国传统译论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即佛经译论时期、传统译论时期和当代译论时期。但按照研究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两个时期, 即传统译论和当代译论。传统译论自支谦的“文”、“质”说至 20 世纪 70 年代; 当代译论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中国传统译论的思想基础是儒道释思想, 其思想核心是“信”与“和谐”。

关键词: 传统译论; 当代译论; 儒道释思想; “信”; “和谐”

中国传统译论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即佛经译论时期、传统译论时期和当代译论时期。但按照研究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两个时期, 即传统译论和当代译论。传统译论自支谦的“文”、“质”说至 20 世纪 70 年代; 当代译论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王宏印(2003)的划分标准是将现代语言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作为分水岭。我国卓越的翻译家季羨林先生也曾经说过:“倘若拿河流来作比, 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 有水满的时候, 也有水少的时候, 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 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 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国传统译论的思想基础是儒道释思想(王宏印, 2003), 其思想核心是“信”与“和谐”。

—

中国传统译论的思想基础是儒道释思想。中国最早的译论《法句经序》, 作于公元 224 年, 收入梁·僧佑所编《出三藏集》卷七(罗新璋, 1984), 为三国时支谦所著。此序不足三百言, 却道出了支谦的翻译观: ①翻译与语言的关系, 即翻译之难是由语言、文化相异造成的。他说:“天竺言语, 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 语为天语。名物不同, 传实不易。”②指出了竺将炎(即竺法护)的翻译方法及原因, 即竺将炎采用了对译的方法, 主要原因是其只精通天竺语不精通汉语所致, 即“将炎虽善天竺语, 未备晓汉。其所传言, 或得胡语, 或以义出音, 近于质直。”③佛典的翻译方法, 即“因循本旨, 不加文饰”。

辩论中, 支谦总结出了佛典的翻译方法, 他的依据是: ①佛典翻译所译为

佛言，而佛言须“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②老子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③孔子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此序座中人对佛典翻译方法进行辩论时，依据引用的是佛言、老子和孔子的言论，可见儒道释思想从一开始就对我国翻译思想产生了影响。佛言自有其深奥之处，所以“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由此，彦琮的“八备”中有“荃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和“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要求译者“博览经典、通达义旨、精通梵文”等（王宏印，2003），这些要求也是我国译界历来倡导的译者素质。至于“佛言”的翻译，后期佛典翻译大师玄奘的“五不翻”则阐述得更加明确，而且影响也更为深远。严复在其翻译中创造新词、鲁迅保持原有的句法和洋气、翻译中沿袭已有译法以及音译等，都是源自玄奘的“五不翻”原则。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佛言”的翻译，创造新词、保留原文的文化色彩、沿袭已有译法、音译等都成为历来翻译中不言而喻被广泛采纳的原则。梁启超、胡适、钱锺书等著名学者、翻译家都探讨过佛典翻译对近现代翻译的影响。佛典翻译研究根植于佛教思想中，佛典翻译开创了我国翻译研究史，同时也将其核心思想一直传承下来。

孔子和老子是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创始人，他们的思想对翻译的影响在此序中也不言而喻。王宏印（2003）认为，《法句经序》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传统翻译的理论思想，一开始就来源于中国先秦典籍，而蒋述卓（1988）认为支谦的翻译也更受中国老、庄影响，在名词概念上常拿老、庄词语与佛教大乘经典词语相牵合。中国传统译论中的“信”、“善”、“美”、“切”、“化境”、“忠实”、“求真”等概念都体现了儒道释思想的兼容调和，而“信”与“和谐”两大核心思想主宰着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路径。

二

求信为本是中国传统译论的核心思想之一。支谦在《法句经序》中引用了老子的言论“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和孔子的言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将“信”的概念引入了翻译研究。在支谦看来，老子的话非常有道理，“信言”与“美言”构成了一对矛盾，竺将炎的翻译“近于质直”，为“信言”，因此“其辞不雅”，即表达“不美”；维祇难也认为佛经翻译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即译经需表达原义，不必讲究“饰”和“严”，只要做到“易晓”和“勿失厥义”就行了（陈福康，2006）。同样，孔子的话也给了翻译以启示，

即语言文字难以完全确切表达思想内容，因此支谦的结论是“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各家言论均传达出一个字，即“信”。

支谦引用了老子的“信”，老子的“信”有“诚实”、“诚信”、“守信”之意，是说话、做事的准则。“信”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概念。老子《道德经》八十一章首句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老子崇尚“信”。他说：“信不足，焉有不信。”（《老子》十七章）意即，已失信于人，必然人不信我。所以信不足，于是有不信（冯达甫，2006）。另外，《老子》八章也有“言善信”。在《老子》中，“信”的重复达到了15次之多。另外，“信”在孔子的观念中为人立身之本。“信”是孔子道德观念仁、义、礼、智、信之一。弟子要去做官，孔子说“恭敬忠信可以为身”，并告诫说：“欲人之信己，则放言而笃行之。”（孟庆祥等，2003）商鞅变法，首在立信。孔子说：“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又说：“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在《论语》中，“信”出现了37次，而在《庄子》中“信”出现了34次之多。

儒家思想早在西汉中期就被确定为统治思想，代表儒家思想的《论语》很早就成为学派内部传述、研究的重点，有关的文献达3000种之多，（金良年，1998:4）自古至今，从未间断过。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说，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于丹，2006:4）《论语》被看作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治国之本，根植于国人的头脑。影响深远，自古至今；范围广泛，遍及各个领域。同样，道家思想的代表《老子》，“溯自韩非《解老》、《喻老》以来，历代《老子》注家之众，几比与儒家《论语》”（冯达甫，2006）。

支谦辩论中引入了老子的“信”，虽不是作为翻译概念提出的，却为此后的翻译标准定了基调。此后著名的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都将“信”作为翻译的第一准则。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阐述的是由于胡语和秦语的不同造成的翻译偏失而指出了翻译的困难，间接地对译者提出了要求，即如何把握两种语言与文化，而从意义上做到勿失信于原文；鸠摩罗什批评当下的翻译如同“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其实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告诫译者翻译要一如原作，不仅要信守原作的意义，还要信守原作的文体。玄奘的“五不翻”、严复的“信、达、雅”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年代译界以鲁迅和梁实秋为代表的两大对战阵营对“信”的大讨论；此后王佐良的“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刘重德的“信、达、切”都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译论对“信”的重视以及对“信”的理解的不断深化与升华。支谦

和道安的“信”是强调意义上遵从原作，鸠摩罗什不仅强调意义，还要求文体上遵从原作，此后的争论将“信”的涵义不断扩大，“信”从单纯的意义，引申到文体、文法结构；“信”从遵从原作，到原作者，到译作、译作读者。

三

中国传统译论思想的“和谐”观也是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基础。“和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译论观点之间的矛盾统一；②译作与原作的和谐；③译作与译语文化的和谐；④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和谐。

支谦的《法句经序》提出了“文”和“质”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将翻译方法中的这一对矛盾置于翻译讨论中。“文”和“质”虽然是佛典翻译方法中的一对矛盾，反映了争执两派的不同观点，但同时也反映了佛经理论家对两种语言与文化间矛盾统一的考量。后期杰出的佛经翻译理论家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强调保存原典质朴的文体，传递原典的真实信息。译者除精通两种语言及其不同的叙述方式和叙述结构外，还要掌握蕴含于两种语言内的不同风俗和高深的佛教教义（周裕锴，2003）。要求译者最大限度地调和意义和语言，以开放的胸怀包容、接受异质文化与语言。鸠摩罗什的译论又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佛经译论的和谐精神。他要求译者不仅要注重质，还要注重文，强调文质结合的译经方法，即，在意义和语言上与原文和译文达到和谐统一。彦琮和玄奘，或强调直译或强调意译，或与原语达成一致，或与译语达成一致。总之，这些杰出的译经理论家，无论是探讨译经方法，还是探讨译者素质，都从不同的侧面倡导和谐观。

“和谐”观实际上是中国儒家中庸思想、道家之“道”和佛教圆满调和在传统译论中的集中体现。首先从支谦的《法句经序》中就可以看出儒道释思想对佛经译论的影响。《法句经序》中既有佛言，又有老子和孔子的言论。道家讲无为，万物皆有“道”，一切顺其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儒家讲中庸，万事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儒道思想已经流行了几百年，因为要和中国传统的思想习俗相适应，佛经翻译中采用了“格义”的方法，以佛教比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其达到调和共存（马祖毅，1999）。而佛经翻译理论家却以“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的观点彰显了道家之“道”与儒家的中庸思想，对异质文化采用了包容的态度，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达到了两相调和，兼容并存的局面。

后期的译论思想深受佛经译论的影响。严复的“信、达、雅”影响了中国译论 100 年。钱锺书在评论严复的翻译标准时说过,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中的“信、达、雅”三字皆出自支谦的《法句经序》(罗新璋,1984)。严复的翻译观与中国佛经译论一脉相承,既体现了与原文思想内容的和谐一致,又体现了与译文语言表达的和谐一致,而且这三个字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和谐统一。鲁迅要保留“洋味”,傅雷要“神似”,钱锺书要“化境”,王佐良要一切“如之”,许渊冲要“美”,中国译论在长达一百年的拉锯战中,虽有“直译”、“意译”的论争,但最终“直译”、“意译”走向了调和,兼用并存;是保留“形”还是“神”?争论的结果是形神都有意义,都是翻译需考虑的因素;是“俗”,是“雅”,哪一方也难以取胜,最后还是雅俗各有千秋;“异化”和“归化”,哪种翻译策略更能体现翻译的本质,最终依然没有固定的答案。所有的这些观点都彰显了这样一种理念,即万物皆有道,一切顺其自然,“信”为行动的准则,“和谐”是行动的结果。

四

中国传统译论传承了佛经译论思想,如赵秀明等(2006)所说“中国的翻译学成立于佛典翻译事业”,而佛经译论又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使得中国传统译论兼容儒道释思想一路走来。“顿悟”主导了中国传统译论的思维特点,而“一切尽在不言中”是其表述特点。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西方译论的引入,无论思维方式、研究方法还是表述特点都与中国传统译论大相径庭,但中国当代译论依然秉承了传统译论的传统,一如既往的表现出其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与各家学派和谐共处,共同繁荣世界的翻译事业。

参考文献

- [1]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2] 金良年. 论语译注[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3] 冯达甫. 老子译注[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4] 蒋述卓.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思想[J]. 1988(5).
- [5]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 [6] 马祖毅. 中国翻译史(上卷)[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7] 孟庆祥, 孟繁红. 孔子集注 [M].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8] 钱锺书. 译事三难 [A]. 罗新璋. 翻译论集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9] 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10] 文军, 高晓鹰. 论佛经翻译时期的翻译批评及对当代翻译批评的启示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2).

[11] 于丹. 《论语》心得 [M]. 中华书局, 2006.

[12] 赵秀明, 姜春兰. 佛教与中国翻译学 [J]. 上海翻译, 2006 (2).

[13] 周裕锴. 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的现代诠释

——作为建立翻译学的一种努力

王宏印 刘士聪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天津 300071)

摘 要: 本文假定存在两种翻译学, 即普遍的翻译学和分国别的翻译学, 而把建设中的中国翻译学作为终极的普遍翻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 中国翻译学理应是中国传统译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演进阶段, 和中国翻译传统的一个历史的发展结果。为之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对于中国传统译论进行科学而有效的现代诠释, 使其顺利地朝着中国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和现代形态这一理想转化, 作为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种努力。

关键词: 传统译论; 经典文本; 现代诠释; 中国翻译学; 普遍翻译学

关于建立翻译学的讨论, 以及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各种理论和实践的努力的背后, 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两种翻译学的概念。一个是普遍的科学的翻译学, 即不分国别和语种的翻译学; 一种是不那么科学的比较具体的翻译学, 它可以按照不同的语种和国别而冠名, 如称为“中国翻译学”或者“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等等。承认这一基本的认识上的分野, 就意味着两种说法各有道理, 并有并存的必要。一种认为: 既然翻译学是一门科学, 科学又是研究普遍的必然的知识体系的, 那么, 翻译学就不应该是分国别和语种的, 而应当是普遍适用的, 带有原理性质的, 不应强调各语种的特点或某一国家的学术传统和理论特色的。另一种认为, 这种普遍的科学的翻译学固然很好, 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实现, 也许永远不可能实现,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根据汉语的特点和汉外互译的特点做一些描写性的、对策性的、语际对比性的理论研究工作, 以此为翻译学的建设作一点贡献。为了使讨论能够尽早进入正题, 避免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 或者在概念上兜圈子, 本文作者假定存在着上述两种意义上的翻译学, 至少是作为观念形态的存在。并且认为, 理想的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理应是普遍适用的, 具有终极目标性质的纯理论体系, 如同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的形而上学所已经达到的程度。然而, 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质, 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 我们不

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上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所做的一种努力。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简称传统译论）自然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这里的认识基础包括下列命题：①翻译学在本质上应当是理论的，即便这种理论包含对于实践的各种关系，比如，对于以往的翻译活动作出正确的理论说明，或者为今后的翻译实践提供必要的指导原则；②在中国现代译论建立以前，我们只能在传统译论中寻找它的理论源泉，并把形成中的中国现代译论视为中国传统译论的一个合乎历史和合乎逻辑的发展；③不过，这种发展不可能是由传统译论自然而然地长入现代译论，而应当做一番人为的转换或转化工作。为了实现这个转化，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现代诠释。鉴于近人已经有了一些局部的有限的诠释工作，我们要做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系统的重新诠释。因为我们相信，成功而有效的现代诠释会促进中国现代译论的诞生乃至中国翻译学的建立，从而为普遍翻译学的建立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

为此，本文提出三项基本任务：①关于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划界：界定，分期；②关于中国传统译论的基本认识：特点，缺陷；③关于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诠释：方法，限度。

一、关于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划界

何谓中国传统译论？这一基本的理论问题首先需要一个简明的界定。为此，我们的尝试性的界定是：凡在中国现代译论产生以前，在中国学术领域内产生的关于翻译的一切理论，都属于广义的中国传统译论。但是，这一极为简单的界定需要几点说明：①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乃是以中国传统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②传统译论的时间划界并不起自中国翻译史上最早的翻译实践，其下限也不是政治史或社会学史意义上的历史分期的现当代，而应以译论本身的逻辑演进为根据。③因此，中国传统译论并不排除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如佛经和西学的治学方法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并没有大到足以改变其传统的翻译理论形态和性质的程度。④总而言之，中国传统译论是指在翻译论题上、研究方法上、表述方式上，以及理论特质和精神旨趣上都表现出浓厚的传统国学味道的译论，以有别于别